

许子东:从呐喊到流言的文学变迁



许子东教授

近日,许子东教授经典著作《无处安放:张爱玲文学价值重估》内地首版,本书是他站在现当代文学史脉络中回望张爱玲,同时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化的一个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有三条主要发展线索。第一条是文学要忧国忧民、批判社会,以文学作为武器改造中国。鲁迅、巴金、茅盾都属于这类。第二条是郁达夫、梁实秋、林语堂这一类,他们坚持作家的文学性。第三条以大众娱乐为中心,从鸳鸯蝴蝶派到金庸、琼瑶。作家张爱玲不属于任何一条,因而有了书名中的“无处安放”。

大众熟知许子东是从《锵锵三人行》中那个讨论各种声色世相的媒体人开始的。实际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刚研究生毕业的许子东就以一本《郁达夫新论》在文学评论界崭露头角,并自此踏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焱仟/文 施向辉/摄

1

“跨界”似乎一直是许子东的人生关键词之一。

许子东年轻时曾经在钢铁厂工作,为了去宝钢当工程师,他大专学的是冶金自动化。下乡时,他读到了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从此爱上了文学,并开始动笔写小说,寄给各种杂志,奈何不断被退稿。

“那是七十年代末,我还给巴金寄过稿子,巴金给我回信说,谢谢你的信任,但我只做创作,不搞评论诸如此类。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大作家亲笔回信。”

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梦,许子东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现代文学研究生,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这个理工男一脚跨进了文学圈。

研究生备考的时候,许子东偶然看到一本郁达夫的选集,为他直白地描述自己性苦闷的写作而惊讶。同时,现代文学中两个最重要的作家,鲁迅和郭沫若,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和,但都与郁达夫是好友,这使许子东感到困惑,引起了他对郁达夫的兴趣。

读研期间,为了做读书报告,在钱谷融的鼓励下,许子东开始了郁达夫研究,并写了一篇《郁达夫与日本》。钱谷融帮他改了六个错别字,然后让许子东送到学报去,看看能不能发表。

“今天大学教授在学报发表一篇文章,就算是一年的学术成果。我那个时候只是研究生一年级,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所以后来我小说就不写了,改写评论了。”

研究生毕业后,许子东关于郁达夫的八篇论文合集为《郁达夫新论》,在浙江文艺出版社作为“新人文论”丛书出版。“新人文论”可以说是八十年代青年评论家的一次集体亮相,黄子平、赵园、陈平原、王晓明、蔡翔、吴亮等,后来都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

2

出版了《郁达夫新论》之后,许子东自然而然地留校任教。自此开始,他的脚步和身影频繁出现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

1984年,许子东参加了日后影响深远的“杭州会议”,这个会议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寻根文学,阿城、韩少功等文学大家都参与了这次会议。“当时在西湖边上,我们吃完饭散步,韩少功对我说,他回去就要弄点干货。后来,他就写了《文学的根》,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

1985年,郁达夫去世四十周年,许子东被中国作协邀请到北京写一个纪念郁达夫的讲话。写完之后,许子东参加了中国作协的一个会,谈论一个新作家的新作品,出席会议的有汪曾祺、陈建功等著名的作家。讨论的是莫言的第一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1989年,许子东担任了《辞海》现代文学条目的编辑。“现代文学部分的修订,名义上是孔罗荪(前上海

作协秘书长)、李子云(前《上海文学》副主编)负责,实际上是我跟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在具体工作。我把定义郁达夫的‘颓废’改掉了,把徐志摩的什么‘消极情调’改掉了。那时候我征求李子云的同意,说《辞海》不应该有价值判断吧?李子云说对,讲史实就可以。”

许子东曾撰文回顾整个现代文学批评的大概过程,他认为,到了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批与作者是朋友的年轻学者,“他们直接使得八十年代的文学迅速从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转向寻找传统的寻根文学和探索现代派技巧的先锋文学。而这个阶段,我很有幸参与了。”

3

许子东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赴美做了几年访问学者之后,恰巧香港岭南大学有个位置。李欧梵教授建议许子东,如果你想对中国文学有一点贡献的话,还是回去比较好。许子东就去了香港教书。

“研究生开始读郁达夫,读当代文学,使我能够把文学批评作为我的终生事业。在我这里,教书是职业,文学批评是事业。我很幸运,可以做一份喜欢的事情,同时能赚到钱,并且得到社会的承认。”许子东坦言很享受自己的职业。

如果不是《锵锵三人行》这档节目,许子东不会从教书匠跨界成为媒体人,为除了中文系学子之外的广大观众所认识。这也许是他践行自己“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起更大的作用”的理念的实践之一。

近几年,许子东的文学课堂不仅开在讲台上,也在各视频、音频频道上线。2016年,他在腾讯平台上直播《现代文学课》,“学生”过百万,为众多的文学爱好者打开了视野。

“我的原则是,我跟《百家讲坛》那些不一样,不是迎合听众的需要、不是为了畅销。我就是坚持上课,该怎么上就怎么上。”许子东坦言效果有可能两面不讨好,“从上课的角度,别人可能会说,这么多课,难道你的最好吗?凭什么你上节目。从受众的角度,他们也可能和蒙曼、陈果她们的课去比较,觉得你没有她们畅销。黄平他们也说我在做一个很艰苦的工作,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没有为了什么目的而开这个课。”

现在,许子东在“看理想”平台讲授“20世纪中国100部小说”,为了讲课而站在文学史的结构中重读经典。尽管没有了凭兴趣阅读的时间,但许子东觉得能够重新认识作品,“好处是我现在读文学作品,都把它放在一个‘大棋盘’里。这部作品好不好?有没有什么新意?我脑子里分分钟就想出来了。比方说,《白鹿原》中所有的男人都围着田小娥,再看《死水微澜》,也是各种不同背景的男性围着一个女主角。我才发现中国作家这种“一女多男”的模式,用结构主义的说法,一个作品,我现在单独看和放在文学史中看,有不同的作用。”

理论家的概括是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从《呐喊》到《流言》,既是两个作家,两部作品,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用

对话

鲁迅还在身边 伴随我们每一天

读品:您为什么偏爱鲁迅?

许子东:我喜欢鲁迅是因为在我读书的时候只有鲁迅的书可以读。小时候也读过很多别的书,觉得很精彩,但经不起考验。鲁迅不是,他今天还在我们身边,伴随着我们网络上的每一天。不只有我,鲁迅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和感情的源泉。

读品:有讨论说,张爱玲是否已经(或正在)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另一个“神话”,您如何看待这种“相提并论”?

许子东:把张爱玲和鲁迅相提并论当然是抬高张爱玲,但是它想说明一个现象,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变化方向。这句话最早是在香港的一个研讨会上,王德威顺口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从呐喊到流言……”表面上它讲的是两个作家,它也反映了时代的一个变化。呐喊是什么?呐喊是战斗、是启蒙、是救亡,是把文学当作武器。流言是什么?流言就是街谈巷议、八卦。我们小的时候,看报纸、听广播,多数是有一篇重要的文章结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等,这些是呐喊。今天刷屏的多数是什么?是某个公众人物离婚了,是花边新闻的东西。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从载体的变化,从社论、大专家的评论员文章,到一个网络的信息、可能是一个假的信息,成为社会焦点;从看新闻联播,到今天公众号刷屏。所以我想从《呐喊》到《流言》,既是两个作家,两部作品,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用理论家的概括是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

读品:作为一名中文系教授,您认为现在的文学教育应该是怎样的?

许子东:文学教育应该多元化,不需要确定教材,教育就要打开思路,没有标准答案,让你自己去思考。读文学不是教你一些僵化的知识和道理,而是给你感悟的能力,以后再碰到类似的作品,再碰到类似的人,你能够用鲁迅的精神,用张爱玲的敏感来接近,这才是现代文学的精神。所以我认为教育第一要多元化,尤其是参考的东西,所以就要放开研究。

读品:您曾经说“中国现代文学有两个轮子,一个是报刊传媒,一个是学校教育。”如何看待之间的关系以及变化?

许子东:现代作家靠写作谋生的人极少,他们必须兼职。要么在大学里任教,要么做报纸杂志的编辑。作家做报纸杂志的编辑,写的作品就比较差异化,但这一部分的作家,在我们的现代文学中常常被忽视,因为我们只研究进入教育系统的这些作家。今天这种分化更明显了,这边评选“茅盾文学奖”,那边连载盗墓、穿越。但茅奖照样有它自己的权威,因为你不懂这个就是没文化。贾平凹的书写得再难读,都有几十万的销量。

读品:有人认为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许子东:当代文学现在的主动力是在长篇,所以看杂志显示不出来,那个时候最尖端的,就像足球前锋梅西,是在《收获》《钟山》《当代》上。总体来讲,文学比那个时候边缘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和八十年代是文学发展不可复制的两个高峰时期。但是也不要看低今天,今天文学发展的推动力在长篇。

读品:您如果去写小说会写什么题材的小说?

许子东:我设想过好多种不同的写法,比方说我幻想一下20年以后中国的面貌。也想过把我这一辈子碰到的跟性有关的事情写出来,一定很有挑战性。后来一想对不起朋友,太多隐私的事情真是不能写,虽然肯定是有价值的,就像《卢梭忏悔录》这样。所以我后来想还是写我的家庭。写我父辈他们年轻时真实的生活,因为我发现他们年轻时代的生活往往被扭曲了。我只要真实地记录某一天具体发生的事情,就能够让现在的读者震撼了。



许子东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郁达夫研究、张爱玲研究等。著有《郁达夫新论》《香港短篇小说初探》《无处安放:张爱玲文学价值重估》《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当代文学印象》等作品。



扫码看采访视频

大读家

读书人,写作者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